

由永別亭到陸祐堂

布裕民

1. 前言

我的〈游泳雜憶〉在《田野與文獻》第 85 期刊登後，朱溥生先生（兒童文學作家及專欄作家）徵得華南研究中心同意，在溫哥華一份以華人為對象的刊物《新天地》連載刊出。朱先生說，海外華人朋友，都很喜歡看這類懷舊的文章。《田野與文獻》的黃永豪編輯對我有另一種啟發。他說，歷史是屬於眾人的，每個人一點一滴的經歷，記錄下來，可構成一個時代的大歷史。我想，我求學的歷程，相當曲折，可以反映香港上世紀 50 至 60 年代教育的一個側面，因此不揣淺陋，把我從小學至進大學前一段經歷，記述出來。文中兼記了一些家庭情況，也可反映當年某類移民的一個側面。

2. 一點家世

因為我的姓氏較為罕見，往往被人問及「布」是不是北方人的姓氏。事實上我是地道的廣東人，籍貫是南海佛山。據故老相傳，「布」是佛山「雞田布老」四大古姓之一。我的祖父，大概是一個生活於廣州，讀過書而家道中落的商人。他的一個妹妹，是江孔殷太史（以創製「太史五蛇羹」最為人知曉）的四姨太，使布家稍稍攀上一點富家的味道。大家如果看過杜國威先生編寫的話劇《南海十三郎》，當會留意到劇中演員所扮演的那個當家的姨太太，就是我的姑婆，她的名字叫布白。南海十三郎（編者按：江譽鏐）是江太史的第十三個兒子，論輩份是我的表叔。我的父親是江太史第十一房姨太太的乾兒子，因此和江家那些表兄弟姐妹都是有來往的。

攀上一點富家味道是沒有甚麼意思的。父親排行第五，祖父過身時，他只有十多歲，便得自行謀生。那時他的三姐在上海，他便往上海投靠姐姐兼自行謀生。輾轉間他到了南京當政府公務員，也

就是這段時間，認識了母親。

母親出身大家閨秀。在 30 年代，能夠上新式中學唸書的女子，真是寥寥可數。我的外祖父在當時應該是新思想人物。看他為三個女兒起的名字便知其一端，一個名均權，一個名均衡，一個名均量。母親是大女兒，名字叫徐均權，後來改名徐澄宇（我很少見到這種氣魄的名字）。母親告訴我，他們徐家是明初名臣徐達的後代。母親中學畢業後沒考上大學，便當了公務員，也就是在那時認識父親，後來便結婚了。

抗戰時，父母隨著政府遷到了重慶。我大哥是在重慶出生的。1945 年抗戰勝利，父母沒有隨政府遷回南京，選擇離開政府，拿一筆遣散費回廣州，準備轉來香港。那時我在母親的肚子裏。母親常告訴我，她是懷著我擠在公路車上，由重慶到廣州，顛簸了 18 天，我沒有在路上給顛下來，算是萬幸了。到廣州後買了車票前往香港，起行前一天，作動了，迫得留在廣州。我是在廣州出生的，當時是 1946 年 1 月，我排行第二，大約在一歲時來到香港。

父母拿了政府的遣散費，在廣州呆了一段時間後，來到香港。相信父母沒有意識到戰後謀生是這樣困難。他們最初租住在尖沙嘴河內道，還從廣州帶來了一個工人。逐漸坐吃山空，趕緊節約開支，搬到了九龍城寨的木屋居住，那時三妹已經出世，工人往別家打工了。

我家在九龍城寨並不能安居。1950 年 1 月九龍城寨發生大火，燒毀了二千多間房屋，我們不能倖免。當時父母能否帶出一些細軟，我不知道，但知道是寄居在九龍城城南道一間涼茶鋪中，一家人打地鋪，睡板凳好幾個月，靜候徙置。等到何文田徙置區建好，我們搬到何文田新村的沙磚屋，居住了 16 年。到了 1966 年，何文田整個區域改建，

我們便遷到慈雲山的多層徙置大廈。四妹、五妹、六弟都在何文田出生。我的教育，是在住在何文田的時候開始。

3. 學前教育

和很多人一樣，我的教育是由母親啟蒙的。不知為甚麼，一個情景我記得很清楚。每天下午，我和哥哥坐在床上，母親也坐在床上，拿出兩個裝餅乾的鐵盒，每個盒內裝了字卡，讓我們兩兄弟認讀。我還記得，那些字卡都是母親親手製造的。她把拍紙簿紙一張分為8張小紙片，在每張小紙片上，用毛筆寫上很工整的中文字。每天溫習日前學過的，然後加四個新的。日復一日，那鐵盒很快便裝滿了字卡。

現在的人，有五花八門的學前教育，我有的只是認字卡。但我絕對相信，這不費錢的方法，效果極好。我是承傳母親教我時採用的方法教導女兒。我計算過，我女兒三歲半時，能認讀的中文字超過1,000個，繁簡體兼學（當時謝錫金教授不相信可以同時學習繁簡體字，親自對她做過測試），讀幼稚園時，已能自己閱讀大部份兒童圖書，四年級的時候，已讀簡體字版的金庸小說《碧血劍》。假如說我的中文水平還可以的話，首功應歸於我的母親，我的女兒也沾了她的恩澤。

我對母親的學識和能力，是絕不懷疑的。一個千金小姐，來到香港，家境拮据時，能胼手胝足，做小販（賣麵包、賣瓜子、賣水果、開粥檔）、做手工藝（鉤毛線花）、養雞（過年過節時賣給附近的店鋪）、做會計（替附近的商鋪結帳），機會來到時，在一間製衣廠當文員，後來升至主要負責人的職位。我讀初中時，她仍能就我的數學、物理等科目給予指導。也許是工作太勞累的緣故，她在一次腦溢血中過身了，過身時是1963年夏天，才四十一歲。

4. 永別亭裏的小學——何文田新村小學（1950 – 1952）

我母親很重視我們的教育。當知到附近有一所學校開辦，便立刻把我和哥哥送到這所學校讀書，那時我是四歲半。

這所學校名叫「何文田新村小學」，是由一個永別亭改建而成，位置就在現今培正道與公主道的交界，靠近培正中學的側門。何文田地區曾有很多墳墓，亦曾是專門下葬因天花病而死的人的地區，日治時期，曾為亂葬崗，在那裏，有一個永別亭，毫不出奇。不知何人捐資，把這座永別亭改建為一所小學。這所小學，實際上只有兩個課室，只有兩個班級，一年班和二年班。課程如何，我已完全沒有印象了，只是對其中一位老師，至今不忘。

這位老師姓傅，我們都叫他傅先生，是一個年青男子，身形高瘦。可能我家是附近少有的有文化的家庭，他偶然會來我家坐坐。一次，他來我家，給我兩兄弟每人送了一本圖書。我們收到禮物是極為罕有的事，何況禮物是書籍，所以印象異常深刻。這本書可能也是我愛閱讀的一粒種子。

當時政府設有師訓班，給在職教師進修，使他們能獲取正式教師資格。傅先生考進了師訓班，後來到了大埔的大光學校任教。我最後一次見到他，是某年到大光學校做會考監考員，碰到了他，寒暄了幾句，大概他已忘記當年的毛頭小子了。

還有一個人值得一記的。第一天上學時坐在我鄰座的同學，名字叫鄭鍾雄（工作時的名字是鄭榮泉）。小學畢業後輾轉進了英國皇家海軍當軍艦上的廚師，後來成了港督府（後來禮賓府）的廚子，曾任最後兩屆港督和第一屆特首的主廚，和我六十多年情誼，至今不衰。

5. 德明中學晚班（1952- 1954）

何文田新村小學只辦到二年班，那我們怎樣升學呢？鄰近不是沒有學校，但有些學費昂貴及門檻極高，如英皇佐治書院、培正中學；有些我又不願意進去，如勞工子弟學校。我們村中的小孩，很多都不進學校。母親是很重視我們的教育，四方打探之下，知道在旺角的德明中學，開有「晚班」小學，便把我們送到那裏。

德明中學是有台灣背景的學校，校名也是用孫中山先生的名字。當時的校舍在今旺角麥花臣球場側，洗衣街和山東街交界處，連操場在內，是一方形約四層高的建築物。我還記得一邊是教學樓，另一邊圍牆下有一個講台，講台的牆上有國徽，中

間是操場。操場是學生集合的地方，但在平時，我可以操場上玩耍和奔跑。講台則是在學生集合時老師訓話的地方。我會用國語唱中華民國國歌，「三民主義，吾黨所宗……」就是在集會時學會的。

晚班有別於夜校。所謂晚班，是在日校學生放學後，下午 5 時開始上課，至晚上 9 時放學，學生有四個小時在學校，課程較充實，與正規日校小學沒有太大分別。而夜校是下午 7 時上課，9 時放學，只有兩個小時，課程便大為減小了。我當時讀的是晚班，所以後來在銜接上正式小學，沒有太大問題。

在德明晚班，大約讀了兩年吧！除了當時唱的中華民國國歌留在腦海裏，還有一事至今不忘。我是一個小頑童，一天小息，在操場上，跳上乒乓球桌，模仿著小人書（當時叫做公仔書）上的架式，說是打擂台，結果從乒乓球桌上掉下來，左手手肘關節錯了位。回家後不敢告訴父母，哥哥也為我瞞著。但手肘紅腫疼痛，那能瞞得住呢，結果母親把我帶到鄰巷一個街坊處，讓他料理。我還記得他讓母親別過頭不要看，跟著他雙手一拉，關節已復了位，跟著敷了藥，上了夾板，一個星期後便復元了。現在有一句話，說「高手在民間」，有一定真實性。

6. 樂道小學（1954 -1957）

跟著，在我們家居附近，新開一所學校，我便轉到這所學校，算是第一次在一所正式學校就讀了。那時我是四年級。

這所學校是樂道小學。樂道是尖沙嘴一條街道的名字。在那裏有一個基督教會，剛巧又叫樂道堂。就是這個教會，在何文田區辦了這所小學。這所小學現在已不存在了，但一所樂道健康院仍然存在。當這所健康院奠基時，我們一群小學生是曾被帶去當布景板的。樂道健康院是在山腳，樂道小學是在山頂，現在這座山已被夷平了。

樂道小學佔地頗廣。我還記得校舍建築是呈 L 形的平房。L 形的長邊是一列八個課室，兩個課室供幼稚園用，六個課室供小學用，每年級一班。短的一邊，除甬道外，便是教務處和教師休息室。L 形的夾角空間，則是操場，是一片黃沙地。操場頗

大，還有跳高和跳遠用的沙池，但從沒有見過有人練習跳高和跳遠，那只是孩子們嬉戲玩沙的地方，雨天變成一個方形水窪。L 形短邊的外面，也是一片空地，放了兩張乒乓球桌。這是每個小息我們爭相奔往的地方。學校四周，用鐵絲網圍起來，外面山坡上，就是叢生的野草。

學校的課程，多已不記得了，只有一些零星的記憶。上聖經課，每課必要背金句，講完課文後，必有一半時間是唱聖詩。我還記得有一首歌，是把聖經各書卷的名字串連而成，但我從來都記不下，唱不了。一個英文老師，姓關，惡得很，拿戒尺打同學手心是常事。一個體育兼美術老師，姓何，頗得同學歡迎。每天早上，所有學生都要在操場集合，然後做早操，大家跟著何老師的口令「一二三四、二二三四……」在活動手腳。後來的小學，恐怕沒有做早操這回事了。何老師教美術勞作，其中一份作業，我印象仍深，那便是木刻。何老師用毛筆寫了「力行」兩個字在一塊木板上，讓我把它刻了，我還把它上了油漆，很有成功感。聽說後來的小學勞作，都是由美勞教材公司統一提供教材，那學生便沒有機會得親老師的手澤了。

當年樂道小學的學生水平，肯定是不高的。我四年級才第一次唸英文，用的英文課本仍是馬來亞版的（那時還不叫馬來西亞），第一課是「A man. A pan. A man and a pan. A pan and a man」。我不能說老師教得怎樣，但我自己肯定是混混噩噩的。我念到六年級，26 個英文字母，還不能全認出來，但我的成績，從來沒有掉到十名以外。

7. 小學會考

當年，小學畢業已經算是一個不錯的教育階段。小學畢業生，理論上已經可以就業，因此課程中便有一些相當實用的科目，如珠算、尺牘等，這些科目現在都沒有了。亦因為這樣，小學畢業便有小學會考（正式名稱是香港小學六年級會考），由教育司署統籌，讓完成小學六年級課程的學生應考。小學會考在 1962 年被「升中試」取代。

但要知道，不是每一個讀完小學六年級的學生都有機會參加這個考試的。我不知道當年教育司署是怎樣決定每校的考生名額，但我清楚記得，當

年樂道小學只派出六個六年級學生赴考，我是其中之一。

可惜的是，我不知道這是難得的機會，因為考試達某一標準的考生可升讀官立中學或補助中學（即今大部份名校），首 100 名的還有五年免費學位。我的父母也不知道「一試定終生」的重要，因此我完全沒有積極準備。我只隱約記得，考的是中、英、數、常識四科，中文要識很多成語、數學要在短時間內算出很多道題目，包括四則題及文字題，常識要認識很多國家的名字和她們的首都，英文我則全無概念。我沒有積極準備，我相信另外五個同學也沒有積極準備，學校也沒有催谷。住在我們那區的人，能讓子女讀完小學已是少數，沒有誰奢望繼續升學，別說升讀名校。結果，據我所知，沒有一個合格，而事實證明，大部份同學讀完小學，都外出謀生，包括上文提到做特首主廚的同學。他小學畢業之前，是在家中協助父母做外判的「車衣」工作，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製作手電筒的小燈泡，後來赴新加坡受訓做軍艦上的廚子。

8. 樂善堂初中（1957-1960）

一起小學畢業的同學中，我是比較幸運的，因為父母都盡量讓我們有機會讀書。哥哥比我早一年讀完小學，進了位於九龍城的樂善堂中學。我讀完小學後，順理成章也進了樂善堂中學。

樂善堂中學位於九龍城龍崗道和賈炳達道交接處，過了賈炳達道，便是九龍城寨。那是一個兩層樓高的自建校舍，有籃球場，當時來說，算是正式規模的學校了。上午辦的是小學，下午辦的是初中，是中文中學，沒有辦高中。

我和哥哥每天在家吃過中午飯後，便一起從何文田沿著亞皆老街步行到九龍城上學，大約要走半小時。走路上學的原因是要節省金錢。那時巴士是有學生月票的，每天可乘坐四次，上車後拿出月票給售票員打洞。月票每月 8 元，當時一個分段以上票價二角，用月票能節省一半有多了。但是我們兩兄弟，兩張月票要用 16 元，而我們的學費只是每人每月 15 元。節省金錢的辦法便靠兩條腿走路了，我們也樂得有在街上遛躑的機會。

樂善堂初中的課程是相當完整的，學生程度

則和名校不可同日而語。除了英文科外，其他各科我都能應付得不錯，而且不是死記硬背、囫圇吞棗，這一點在我往後的求學歷程中反映得很清楚。老師中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教中文的凌老師和一位教數學的馮老師。凌老師對中文課本中的選文好像不大滿意，經常從《古文觀止》中選文章來教我們，我最記得在中二的時候，他教我們讀李陵的《答蘇武書》，「子卿足下，勤宣令德，策名清時，榮問休暢，幸甚幸甚……」，上課時輪誦，讓我們唸得琅琅上口，至今很多句子都記得。到我教書有機會編課程時，才發覺很多人認為這篇文章放在中六仍嫌過深。

教數學的老師，名字叫馮秉剛，他在第一課介紹自己時，在黑板上寫上名字，然後說：「這是『秉』字，不是『東』字，把上面一筆移到左旁，才是『東』字。」就這樣我記下了他的名字。能拿自己的名字在學生面前開玩笑的老師，到今天也不會多。當時的初中數學課程，中一讀算術，中二讀代數，中三讀幾何三角，課本都是戰前國內出版的。算術難題極多，我是不大了了的。哥哥高我一班，他的數學好，練習簿也留了下來，我便邊抄邊算，應付過去了。中二的代數，有了 $x y z$ 去代入未知數，算術上的難題都變得容易，因此數學科便成為我的強項。到了中三，可能我較傾向於圖像思維，幾何和三角都學得好，在中上下學期的數學比賽都得到冠軍。我的數學基礎，在我往後的求學中也得益極大。

理科方面，包括生物、化學和物理，是分開三科的。這方面，我便不太好了。學校是有實驗室的，但進實驗室的機會不多。還有印象的，便是用顯微鏡看洋葱皮、製蒸溜水、用砝碼試用天平。不過，有機會進實驗室，還是頂興奮的。實驗室中有幾個人的胚胎標本，每次進實驗室都看上幾眼。

當時的課外生活，便是閱讀。閱讀的興趣自小有。何文田有一個教會辦的、規模非常小的圖書館，我經常前往，坐在矮板凳上看書。《薛仁貴征東》、《薛丁山征西》、《薛剛反唐》、《包公案》、《施公案》、《彭公案》、《七俠五義》、《小五義》等繡像小說，一本都沒有放過，較新派的像《中國殺人王》、《女俠盜黃鶯》等更是看得

津津有味。（後來倪匡的《女黑俠木蘭花》系列，便有《女俠盜黃鶯》系列的影子）。那時剛興起新派武俠小說，市面上又興起租小說的店鋪和攤檔，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說，便是追讀的對象。當時沒有人指點，不曉得讀嚴肅書籍的重要。

9. 聽差生涯

在樂善堂中學讀的三年初中，算是我讀正規學校最長的一段時光。初中畢業後，便失學了。那時，父親在中環一個寫字樓當聽差，母親在一間工廠當文員，二人的收入，養活一家八口，是左支右絀的。要供我們進入高中讀書，看來是無能為力了。1960 年的夏天，父親便安排了我兩兄弟出外工作。哥哥是進荃灣一間紗廠當學徒，我便在中環一個寫字樓當小聽差（office boy）。

小聽差的生涯，其實並不難過。早上要比其他職員較早回到寫字樓，清潔桌椅茶杯，為每個茶杯沖上一杯茶。九時多，領班便會安排我們幾個小聽差出外派送文件，大約中午才回到寫字樓。午飯後，再派送一次文件，六時許便下班。

其實文件多少，派往多少個地方，需多少時間，只有領班知道。習慣是，每天上午出勤一次，下午一次。出了辦公室門口，每個小聽差都是自由的，因此出現了常規性的開小差（蛇王）。老中環都知道在畢打行後門有一間小咖啡店，叫做樂香園，以奶茶和肉卷馳名，那裏就是一個「蛇寶」，不少聽差每天都在那裏消磨一段時間，「歎」其奶茶和肉卷。我雖然失學，但這個工作環境，卻給我很多自學的空間和時間。

10. 工專夜校（1960-1962）

我和哥哥雖然失學，但母親仍是關心我們的學業的，因此，她為我們安排了學習的機會。哥哥在荃灣工作，算是學徒（每天工資二元），住在宿舍，但母親要他每星期出來市區一次，跟一個她工廠裏的技師學藝，以求一技傍身。哥哥後來成了一個技術頗好的機械技師，與此很有關係。我因為在市區工作，便進了工專夜校讀初級班。

那個時候，香港需要較多技術勞工，因此香港工業專門學院（香港理工大學的前身）便開設夜

校，上課地點遍及全港各地。入學條件之一便是學生一定要是日間全職的工人。我因為在一間紗廠的寫字樓工作，因此便具備入學條件，當時就讀的是初級二年級。初級班的程度大約相當於初中。

工專夜校的學生，英文程度大都不好，但整個課程卻用英語進行，科目包括英文、數學、物理和機械繪圖。就我所見，這個課程的退學率是相當高的。開學時一班 40 人，到學期終結時可能只有十多人，學生的英語程度、日間工作的強度、學習動機等等，都是退學率高的原因。但這課程，對我來說，卻是很享受的。這裏英文課程的要求並不高，沒有文法、練習、作文等等，所謂英文科，只是讀一本薄薄的故事書，內容是關於一個青年人從事各種家居維修、機器維修的故事，目的無非使讀者接觸到一些機械、零件、工具的名稱和操作的用語。數學科是用英文課本的，但程度比我讀初中的數學淺得多，我只要搞通那些數學用語便絕無問題了。物理科的情形差不多，因此，我讀的雖是工專，實際得益卻是英文。我最感興趣的一科是機械繪圖。我的幾何根柢使我很易理解如何繪圖，而用畫板、T 尺、大型的三角尺、雲形板等畫具，卻是頂新鮮的。每個星期天的消遣便是在家繪畫機械製圖。

工專夜校的課程難不了我，日間的工作又不太繁重，我「蛇王」的時候做甚麼呢？我不喜歡樂香園（蛇寶）的氣氛。我開小差的時間，都花在書店裏。當時，中環是有很多書店的。記憶所及，有中華書局、商務印書館、上海書店、世界出版社等等。我輪番前往不同書店打書釘，甚至知道新書是在哪一天出版上架，每星期都準時到書店看最新的出版。很多著名的文藝作品，都是在書店打書釘讀完的，如徐速的《櫻子姑娘》、《星星、月亮、太陽》、熊式一的《天橋》等。商務印書館的書畫部，也是我喜歡去的地方。那裏有線裝古籍、碑帖、國內名家的書畫出售。我現在仍在懊悔，恨當時自己不曉得在那裏淘寶。但回心一想，當時何曾有能力淘寶呢？每月月薪只有 50 元，另加伙食費 100 元。上繳 100 元做家用，拿著 50 元，應付一個月一切開支，哪能淘寶。不過，那時常到書畫部溜躑，會不會開啟了我的審美視野呢？那也說不定。

11. 轉折時期的夜英專

我在工專夜校讀了兩年，然後轉學了。轉學的原因不是因為我不喜歡工藝科目，而是因一個轉折，使我另找出路。我在工專夜校的成績不錯，初級三年級考過期終試後的某一天，收到學校的一封信，告訴我可以升讀高級班的「部份時間全日班」。所謂「部份時間全日班」便是繼續讀的是夜校，但每星期有一天要全日上課，在工場實習。我讀的是機械工程，繼續走這條路，最終是可能成為工程師的。但就讀這個課程，有一個先決條件，便是僱主要同意每個星期讓僱員離開工作崗位一天，到學校上課。我拿著這封信去見老闆，徵求他同意，但他沒有答應，大概是不想開先例吧！就這樣，我就萌生了轉讀文法中學念頭，因為我知道，那時候教育司署辦了一所夜中學，分中文部和英文部，教授文法中學的課程。

我產生讀文法中學的念頭，一方面是因為我不是真正在工廠工作，工作也不是與機械有關，我只是一個聽差，走機械工程這條路，是否走得通，很難說。另一方面是與我一起初中畢業的同學，有些升讀中文高中，有些升讀英文中學，看見他們穿著校服，拿著書本上學，而我每天為人洗杯、沖茶、送文件，很是羨慕他們，渴望自己也能做一個正式的學生。但讀日校是沒有可能的了，既有一所文法中學的夜校，便躍躍欲試了。

考讀夜中學前，有一段小經歷，是相當有影響的。工專夜校學期完結得相當早，大概是在五月上旬吧！新學年要在九月才開始，這段晚上空閒的時間，如何打發？我便回到小學時讀過的德明中學，報讀它的英專夜校。那個時候，英專夜校是非常蓬勃的，差不多香港所有可供使用的校舍，都會開辦英專。我已在工專夜校讀完三年級，便順理成章地報讀它的中四 (Form 4)。本是用來打發時間的幾個月夜英專課程，卻使我往後讀書的進程順利起來。

12. 官立夜中學 (1962-1964)

官立夜中學，只是為了方便稱呼，借用了一個日後才有的名字。我就讀的時候，是一所沒有校名的學校。叫做「Secondary School Course,

Evening Institute, Education Department」，只是教育司署夜學部的一個課程，而不是一所學校。(圖 1)

我入讀的時候是這課程開辦的第二年，我報考的是英文部五年級。這裏要補上一筆，一般文法中學是五年制的，但這所夜校，相信是為補課時的不足，是六年制的，即是說，它的五年級，相當於一般文法中學的中四而已。入學試考的是中、英、數三科。中文和數學，我自問可應付得了，英文可能是非常勉強的了。筆試合格後還要面試，我填寫的學歷是工專初級三年級，德明英專中四，現在報讀五年級，可說是順理成章，結果我被取錄了，幾個月的英專學歷，產生了效果。要是一切順利的話，我只要讀上兩年，參加中學會考合格，我便是正式的文法中學畢業生了。

夜校當然沒有自己的校舍，我上課的地方，是借用伊利沙白中學的校舍。那裏的課程，和日校沒有分別，只是偏向於文科，學科包括英文、中文語文、中國文學及歷史、公民、歷史、地理、生物、數學，共八科。要留意的是，中國語文和中國文學分屬兩科，而中國歷史非獨立科目，公民後來改為經濟及公共事務。當時所謂會考合格，是要五科合格，其中必須包括英文科、一個第二語言和一個理科，因此生物科便放進課程中。學科和日校沒有分別，但課時便少得多了，每天上課兩小時，分三節，每星期只有 15 節，算算便知道，有些科目每星期只有一個教節。

夜中學的教師，差不多全是日校的全職教師，而且多是官立中學的教師，學歷是沒得說的。但因為是夜校，老師們都來去匆匆，加上教時極少，很少機會和學生交流，印象深刻的老師很少。記得的老師當中，其中一位是蘇曾懿老師，教授中文。他國學造詣很高，但面對一班根基甚淺的學生，並無發揮的機會。他教五年級的中文，那已是會考的課程內容了。第一課是「詩經三首（《蓼莪》、《陟岵》、《凱風》）」，第一個習作便是「何謂六義四始？」現在看來也是一個頗深的題目，但我「打書釘」的工夫幫了我。商務印書館有很多文史哲的書籍，我看了一些參考資料，拼湊著寫了長長的一個答案。這個答案的水平可能是他意料之外，

給了我 A 級分數。他出的作文題目，今天看來也不合時宜了。我還記得一道作文題是「晚涼天淨月華開」，我忘記寫了甚麼，他給了我 80 分。在作文來說，是很高的分數了。我六年級的中文老師是陳翊湛老師，他日間在女拔萃書院任教，講課講得很好。另一位印象較深的是教英文的李志培老師。他個子小小，談吐溫文，我很樂意和他接近。畢業後，我還到過他家向他請教英國文學的問題。其他的老師，印象都很模糊了。還須一提的是校長蔡國炳先生。他是很嚴肅的，但很關顧學生，學生都對他又愛又怕。但他沒有授課，所以在學校時也沒有很多接觸。

因為課時少，課程多，老師仍是用教名校那種作風施教，如放任自流、不準備筆記、不催谷等，因此直接得益於老師的，恐怕不很多，但我要完成中學，要會考合格啊，因此我自訂了一套計劃去闖這個難關。

在這裏，先稍稍岔開一筆，說說我工作環境的轉變，從而更清楚地說明我準備會考的情況。在 1963 年夏天，有一個朋友介紹一份補習給我，月薪約 100 元。我想，收入雖然每月少了幾十元，但卻多了很多讀書時間，便向父母提出。母親很快便同意我辭去聽差的職位，轉做補習先生，爸爸也無可無不可地同意了。這樣我在 1963 年 7 月，離開了那間公司。算起來，我在那裏工作了整整三年。

事情卻發生了變化。那份補習工作告吹了，而我的工作也辭了，變成了無業的人。那時我決定，瞞著父母，每天如常出門，像去替人補習，實際是到圖書館裏讀書。我那時大約有 800 元積蓄，很節約地花費，相信可支撐到會考之後的。不久，母親因腦溢血猝然去世了。日後回想，感覺到母親留給我最後一份禮物，便是讓我從一個聽差，回復到全職學生的身份。這個轉變，改寫了我日後的整個人生歷程。

13. 準備會考的歷程

上文提過，英文、一個第二語言（中文）、一個理科科目、另加任何兩科，便算會考合格。我的讀書策略，便是針對這個目標來設計的。

首先，是選定哪五個攻堅對象。英文不用說，一定是其中之一。理科方面，數學和生物都屬這範疇。數學我還是可以的，但沒有絕對把握，而生物科，只要絲毫不漏硬啃下去，應是較有把握的。其他三科，中文、中國文學和歷史，對我來說，是很有把握的。還有一科，我選定了地理，因為地理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兩部份。稍有自然科學知識，理解自然地理不難，而人文地理，也是記憶的成分較多。其他數學、公民、歷史三科，我不是放棄，只是量力而為，而不是不勝無歸的拚搏。大家可留意到，我這個選擇，完全沒有把升學的需要計算在內。那個時候，升學的念頭，還未在腦海中浮現出來。

那時我一天 24 小時都完全由自己掌控，我怎樣編排自己的攻略呢？

英文科是必然要攻下的堡壘。當時會考英文考指定讀本、英語知識和作文。指定讀本部份有兩種選擇，一種是讀四本英文原著，一種是讀十本簡化讀物 (simplified version)，每本約百二三頁。香港傳統名校選的多是第一種，其他的多是第二種，我們選的當然是第二種了。這科考試，考核指定讀物的內容鉅細無遺，大至一個情節、一樁事，小至一個人名，一句對白。我的攻略是把這十本書讀至滾瓜爛熟。只要準備充足，應付這類考卷是有十足把握的，而且這卷一定要拿高分，以補其他兩卷的不足。熟讀十本小書，對程度高的學生來說是易事，十天半月便可完成，但對程度低的學生，卻並不容易。對我來說，每本書的首十多頁，每頁的生字便多達數十，查字典後寫下的解釋密麻麻。但我發現一個現象，熬過開頭的十多頁後，後面的部份，生字便越來越少，進境便越來越快了，這給我莫大的信心。再說，讀這些書本是不能倚賴學校的進度的，事實證明，會考已到，學校遠未教完那十本書。我自訂的進度是，爭取在十二月完結之前，自己把這十本書讀透。

英語知識，基本上是考英語語法。英語語法，規則繁多，對我來說是「老鼠拉龜，無從入手」。我不像那些自小便開始浸淫英語的學生，自然而然地掌握英語知識，我是要一板一眼逐項學下來的。後來我發現英語動詞時態 (tense) 是必考的，跟著

更大的發現，便是發覺掌握了英語動詞的用法以後，句式等等便容易明白了，因此，便對動詞時態下了大工夫。我的英語，是靠讀語法書而掌握的。對我幫助很大的一本英文語法書，叫做《*Practical English Grammar*》，是英國出版的平裝袖珍袋裝書，只售一元五角，我對此書念念不忘。

英語作文，是無從主動準備的，只能隨機應變了。

數學科的攻堅方法，與英文不同。我知道掌握數學是不能臨渴掘井的，因此我和一個同學相約，把考試課程內的數學課題，就課本內的練習，順序每天計算五題，上課前繳交，互相督促和檢核。要知道，夜校的數學老師，是從不布置家課的。這個同學，名叫馮錦亭，雖已沒有聯絡，但心中常記得他。他會考的成績也不錯，進了師範，當了老師。

其他科目的準備方法，便是集中攻堅，由八月開始，一個月準備一科，把該科會考課程的內容，由頭至尾準備妥當。自訂的標準是，在該月該科準備結束時，已足以去應付考試，得到預期合格的成績。

我準備考試，也不是死讀書的。記得研習生物科時，讀到哺乳動物一節，便和馮錦亭到市場買一隻白兔，在家裏解剖。要知學校是沒有實驗的，一切都得憑想像去揣摩理解，要是能手到眼到，便大不同了。我們手忙腳亂地麻醉了小兔後，便動手解剖，然後細心對照課本上每個系統的繪圖，最後剩下骨骼，便逐塊骨頭指認名字，以增強記憶。後來還想把骨骼製成標本，但沒有成功。

我們準備會考，讀「天書」嗎？我們的課本，都是英國出版的，譬如自然地理，所舉的地貌例子全是外國的，少一點想像力也不能理解。那時市面上的天書很少，但有兩本值得一記。一本是中文科和中國歷史科的，作者是「魯繼」，他的中文科天書是人手一本的。「魯繼」原名陳繼新，後來我在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進修時，他是導師之一；巧合得很，他的公子陳國威先生又是我的同事。另外一本是生物科的。那時的生物教科書也是英國出版的，用來應付考試，完全不適合，後來買得這本天書，準備起來便順手得多了。後來知道作者寫此書時還

是在皇仁書院唸預科學生，油然產生「有為者，亦若是」的念頭，預科畢業後動過和同學合作寫一本中史科天書的念頭，找過廖慶齊老師做顧問，最後沒有成事。

集中攻堅，是要有一個前提的，就是沒有人來攪亂你的讀書計劃，又要能不去依賴學校教學的進度。要是在普通學校，三日一個小測驗，五日一個大測驗，為了應付測驗，肯定無法採用這個方法。幸而夜中學是完全沒有測驗的，計劃便順利進行。

集中攻堅的成效是明顯的。在 1963 年的聖誕節假期前，我已把所有科目的會考課程熟讀了一遍，難點易點已了然於心，可以作第二輪準備了。用相同方法，第二輪準備便快得多，到了 1964 年的復活節，第二輪準備又完成了。那時我有點不耐煩了，渴望著考試的日子早點到來。由復活節到考試的日子，我又作第三輪的準備。這次，我猜題作重點準備了。這時，外間的「貼士」滿天飛，我都沒有理會。我知道會考試題是不會外洩的，滿街的「貼士」只是出自多間學校的模擬試卷。我發覺一個道理，只有對整個考試課程全面掌握的情況下，再參考歷年考卷，才有條件猜題，即使猜不中，仍立於不敗之地。我當時已全面準備妥當，可以放心猜題了。

還有一點是要說明的，因為沒有別人指導，學校沒有測驗，我對自己的準備，是沒有參照的基準的，只是盡力衝刺而已。當時的目標是「合格」，每科的目標分數是 40 分。

我報考會考，也是有點特別的。那個時候，所謂文理分科，是沒有那麼涇渭分明的。所謂會考狀元的成績是十科優。十科，不是把所有文理科都包括在內了嗎？一些著名的中文中學，如培正中學，很多學生是報考 13 科的。我受了這些觀念的影響，也希望多報考些科目。另外一個想法是，我的目標是五科合格，萬一所準備的科目中有一些失手，額外報考的科目可能可以補上。因此，在學校所授的八科之外，我加報了機械繪圖（這是工業中學獨有的科目）和打字（這是商科中學獨有的科目，只算半科）。機械繪圖我是在工專夜校學過的，打字則是在做小聽差時自學的。

我自己設計的應考策略，成效如何，就要看放榜揭曉的成績了。

14. 中學會考放榜

中學會考放榜，是每年的城中大事。教育司署是在下午把考生成績公布的，各大報章，甚至是晚報，都已上機印刷，是不可能同日把成績刊登的，因此，各大報章都在報館裏設電話熱線，讓考生在傍晚時分打電話到報館查詢成績。那個時候，會考是有合格和不合格的，不像現在只列出成績。打電話到報館，報上考生號碼和姓名後，可能只得一個簡短答案：「合格」、或「沒有你的名字」，便掛線了。可想而知，撥打這個電話，需要多大勇氣。

第二天的日報，全港合格考生的名字，便全登在報紙上了。沒有名字的，便是不合格。全港親友同學，在同一時間，知道你是「名登金榜」，還是「名落孫山」，壓力是非常大的。跟著，才能回學校拿取成績證明書，因會考合格證書，是要若干日子後才會發出的。我是在 1964 年考會考的，那年考生約一萬人，合格的約五千人，合格率約為百分之五十。每科考試成績分為九級，優是第 1 級，約是該科合格人數的百分之三，良是第二和第三級，約為合格人數的百分之三十。第四、五、六級都算是合格，第七、八、九級算是不合格。當時我們戲稱為「九品中正」。

我因為讀的是夜校，要到晚上七時才能回學校聽取成績，請校長寫成績證明書，才能計劃下一步。我的成績，相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包括我自己。我的目標只是五科合格，結果，我報考的十科全部合格，其中有一科優，三科良。中國文學及歷史，優；中國語文、地理、生物，良，其餘合格的科目，除了數學外，都是四級，數學則是五級。

這時我傻了。要是我僅可合格，或成績不那麼好，我會有兩條路。一是找一份工作，再入職場。二是入讀師範，因在會考之前，我報考了師範學院，已被條件取錄，條件就是會考合格。但我的成績，是可以讓我升讀大學預科的。當時入讀大學預科的最低標準只是兩科良，我有一優三良，應該可以找到預科學位，我決定去碰碰運氣。

第二天，拿著那張簡陋的成績證明書，外出找學校。我說簡陋，因為那張成績證明書是用原子筆寫在一張備忘紙上寫的(圖2)。我外出找學校時，是孤獨的，沒有同學作伴，沒有長輩諮詢，沒有老師輔導，只是憑著一股傻勁去闖。這一天，我大概走了兩三間學校吧，結果是鐵羽而歸。所到的學校全部拒絕取錄，只給我一個理由：我的英文科成績不是良。日後我想到一個十分合理的原因：我在會考取得優和良的科目，並不完全符合在預科班修讀文科的條件。

幸好我的傻勁仍未減退，我走到皇仁書院叩門。其實我是不知道皇仁書院是頂尖學校中的頂尖。我記得接見我的是黃義華代校長，他只問了我幾個簡單的問題，便立即取錄了我。我不敢猜測是甚麼原因，慶幸的是，我沒有讓黃校長看走了眼，也沒有墮了皇仁的聲名。那年皇仁文科班取錄的六個外校生，兩年後，只有我一個考進香港大學。

15. 皇仁書院預科的生活 (1964 -1966)

皇仁書院，有顯赫的校史，不像我以前讀過而已湮沒無聞的學校，因此，我只說一些我親歷的瑣事。

a. 經濟

我已經沒有工作一年，積蓄也差不多用盡。我還記得在會考放榜得悉合格的那一天，父親主動給了我 50 元，讓我慶祝一下，兼做去找學校的車資，對這事我是非常感動的。皇仁書院收錄了我，我要轉做一個正式的日校學生，學費和生活開支如何？我日後學到一句話：人的出生不是平等的，但社會應給他一個平等的機會。我慶幸是生在這個地方和這個年代。在皇仁書院，我申請得學費全免，每個月還有 40 元的生活津貼。

40 元一個月夠用嗎？在很嚴格的消費控制下，是可行的。我當時在慈雲山居住，早上從慈雲山上步行下竹園，坐 11 路巴士到紅磡碼頭，渡海到北角，從北角走路到銅鑼灣上學，每天來回交通費 6 角。午膳方面，可到學校橫門對面的大牌檔吃厚切奶油多士，或到大坑的大牌檔吃牛腩碎麵，大概 4 角至 6 角可解決一餐。偶爾會「奢侈」一下，到銅鑼灣豪華戲院側的上海飯店吃上海粗湯麵或

客飯，大約 1 元 2 角便可解決。同學們都不覺得生活艱苦，午飯時聯群結隊，熱鬧得很。每月收到生活津貼的一天，還可以一起去喝一杯咖啡。40 元一個月，只算交通費和午膳費，還稍有盈餘。

讀到大學預科，是有條件去替人補習了。補習的工作不是長有的，但這些收入也稍能補貼開支。

在這段期間最大一筆收入，是在暑期做了一份正職。當時的 O Level 考試是在四月舉行的，跟著的暑假長達三四個月。1965 年的暑假，我找到一份工作，在中環太古洋行飛電部（管理輪船上電報員的部門）當文員，月薪 400 元。我工作了兩個月，中七那一年經濟是沒有問題的了。

b. 學業

我在皇仁的同學，全是頂尖的。他們全是小學會考全港考 150 名內的學生，在校內又曾受英籍老師教導，中學會考後又是成績最好的一群才留校升學，和我這勉強跳出井口的青蛙相較，程度相差不可以道里計。皇仁的老師可能都奇怪黃義華校長為甚麼收了我這一個學生，因為開始的時候，我上課聽得不明白，作業又無法完成得好。當時修讀英文、英國文學、中文、中史、地理、歷史六科。中文和中史我有把握應付，其他的都是「牽牛上樹」，至於英國文學，我對著那些英詩、莎士比亞戲劇、培根論文、狄更斯名著等等，更是茫無頭緒，對那些古典英語，更是見也沒有見過。要知英國文學科，在當年香港，也只有名校學生才敢選讀，但我卻和它遇上了。我請教夜中學時教過我的李志培老師，但因我全無根柢，他也無從給我指導。我又不能像應付中學會考般去閉門造車，只能苦苦地熬了。

幾個月後，學期中考試（這是一學年中唯一的校內考試）成績出來了，全班 31 人，我考第三十。慶幸的是，老師們沒有理會我——不理會反而給了我空間。班主任蘇輝祖老師（蘇曾懿老師的兒子）對我說：你要找人補習了。這大概是一句空話，一個尚要替人補習糊口的人，怎能找人補習預科課程呢？

苦苦地熬是有結果的。漸漸地我對各科都摸到一些門路，上課時不那麼徬徨了。一學年過去，

到考香港大學入學試 O Level 的時候，我六科全部合格，而校內的要求，只要四科合格，包括英文科，便可以升班了。我不單止可以升班，還不必像一些同學般要借助 GCE 考試來補足科目呢！

各個科目中，中文仍是我較好的一科，比很多同學都略高一線。我記得在中六的期中考試中，我的中文作文成績排名是全級第一的。這解釋了我為甚麼是考第三十，而不是三十一。而理科班的胡國賢同學（日後的名詩人羈魂），專程過來文科班，要認識那個作文第一的新同學，還拉我進他的「文秀文社」。還有一件值得驕傲的事，便是在考 O Level 試之前，我「貼」中了中文科考試的題目。我在全個考試範圍四十多篇文章中，根據歷年考題，列表分析，選出十篇，把所得告訴所有同學。結果考試時，八條題目中，「貼」中六題，而只需作答四題。幾十年後老同學見面，還提起這件事。

中七時，我選讀四科 A Level，它們是英國文學、歷史、中國文學、中國歷史。那時，只要兩科 A Level，三科 O Level 合格，便算是預科畢業 (Matriculated)，進入大學，則要看三科 A Level 的成績，因此報考四科，是一個保險。那年，我的學科成績有一定進境，期中考試成績不再排最尾了，而是考第十三。到了學期尾，應考 A Level 考試，我取得三科 A Level 合格，英國文學只算 O Level 合格。可能我合格的三科分數不低吧，我是直接被香港大學取錄的。那一屆我班只有七個同學被取錄，在皇仁來說，可能是意外低的成績了。

c. 老師

皇仁的老師，大部份都是青年才俊，但才俊並不一定是好老師。那個時候，進入官立學校教書，只是成為教育署官員的一塊踏腳石。在學校任教數年後，便進入教育署做教育官，不再沾手前線教學了。我記得在某年校慶的聚餐中，在筵開百席的場合，學長陳坤耀教授上台演說，便大大揶揄了當年的老師一番。我親自接觸到的老師，有如下情況：

一位教中國歷史科的老師，熱愛天文。當年池谷關彗星經過香港，他帶著一班天文學會的同學，夜夜追星，日間上課的時候，坐著打瞌睡。他上課時只在黑板上抄筆記，由板頭抄至板尾，抹乾

淨後再抄，筆記內容出自某本天書；有時甚至自己不抄，著令某些同學代抄，而替他在黑板上寫筆記的同學，下課後還要自己借同學的重抄一次（那時是沒有影印的）。

一位教歷史的老師，每天上課就是拿著發黃的筆記本一句一句地讀，有時連標點符號也讀上，下面的學生就不斷默寫，如是者兩年，從沒變過花樣。

一位教地理的老師，連課程裏要求甚麼也不弄清楚。我那屆選修地理的同學，慘遭「滑鐵盧」，同學們都說受他所累。

好而盡責的老師也是有的，但用今日的標準來看，也僅是合格而已。皇仁的老師，大概奉行的是「不干預」政策，因此，從不催谷，從不逼迫。我讀了兩年，除兩次期中考試外，所有科目合共只有三次測驗，還只是象徵式的，不記錄，不計分。對學生的升留級標準，只憑那 O Level 的公開試。

這「不干預」政策對我來說卻很有好處，它容許我對各學科慢慢適應，容許我有足夠時間去調適趕上。要是換了一所急功近利，唯成績是視的學校，我不是早被勸退，便是自慚形穢而退學了。

d. 同學

皇仁的百年盛譽，來自它的學生。老師來往如走馬燈般轉，對校風影響不大，而由學生形成的校風，對年年進來的新生，影響卻大。同學間在耳濡目染下，糟粕淘盡，英華日展，如此代代相承，校譽亦日益興隆。

我進入皇仁書院不久，校內便為紀念孫中山先生 100 周年誕辰，舉行了一次展覽會。展出工作全由同學們籌劃進行。展出場地是學校的禮堂，偌大的孫中山先生像，有兩層樓高，佔了禮堂整幅牆壁。當時我的感受是很深的。這不是典型的殖民地官立學校嗎？殖民地教育中為甚麼會有這種「國民教育」？

皇仁的同學，貧富都有。我同班同學中有富家子弟，駕著跑車上學；貧者卻家居僭建寮屋，靠政府發下的生活津貼繼續讀書。成績有極好的，也有差劣如我的，但富者優者沒有對貧者劣者歧視，反而能給予幫助。我至今仍感激於心的一位同學，名叫李品初（我最後見到他時是五華中學校長）。

他的成績很好，上課時可以一字不差地把老師讀出的筆記默下來。他知道我無法默下老師的筆記，便用複寫紙留一份副本給我（大學一年級上歷史課時他仍這樣幫助我）。在競爭學位你死我活的時刻，這種做法是極其高貴的。中七時麥子全同學，和我一起研習英詩，每星期每人寫一首詩的賞析，互相借鑒。李文光同學，到我家一起研讀中國歷史。廖明活同學，學問極好，我們還在倚賴天書的階段，他已經讀完劉大杰的《中國文學史》、馮友蘭的《中國哲學史》，後來是港大中文系的講師，專研佛學。我和他在中學和大學兩度同學，和他相處，有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。我們的班長李永強同學（非華人），無論在校時還是畢業以後同學聚會，他還是一貫班長風範，對我們照顧無微不至……眾多的同學的學問品行，使我這個從未在名校讀書的學生，得窺名校學生的風範，對我的品行，甚有影響。

我們的同學，也有頑皮的一面。我們曾在午膳時，躲進課室後面的小房間（天文學會磨製望遠鏡鏡片的工作間）煲奶茶、煮咖啡，弄至滿室香氣，上課前忙開窗開電風扇，班主任進來，他卻裝作全不知情。我們也曾一起逃學，到豪華戲院看早場，因下午第一節是空堂，而上課前班主任是不會親自來點名的。諸如此類小頑皮，增添了學校生活的色彩，至今同學敘舊時，仍津津樂道。

16. 陸祐堂——考進港大

1966 年夏天，參加香港大學 A Level 入學考試，放榜情境，仍可一談。

當時放榜，真是名副其實的「放榜」。「榜」是在香港大學主教學樓的禮堂「放」的，那就是著名的陸祐堂。放榜日下午，陸祐堂裏擺放著多塊壁報板，上面貼上所有考生的成績，科目成績只分三個等級，就是優異、合格和不合格，介乎合格與不合格之間的，便算是 O Level 合格。到時，欲先睹為快的考生，便陸續到場，在壁報板前查看自己的成績。翌日，全港報紙也會刊登成績。我的成績，已如上述，具備申請入讀港大的資格。

我的申請表是遞了，但完全沒有奢望。我只知道我有三科合格，但分數如何，卻不知道。成績

最好的，直接取錄，並通知獲得獎學金；其次的，直接取錄；再次的，可能需要面試，然後等待通知。當時社會上流行一個說法，叫做「等學位」。如果曾經面試而說「等學位」，尚是真話；如果連面試的機會也沒有而說「等學位」，那只是自欺欺人而已。我是被直接取錄的。我記得我收到取錄信的一天，麥子全同學找到我，從袋中掏出一封信，說：「我被取錄了！」我也說：「我被取錄了」。兩人相對雀躍，因我們二人差不多是全班最窮的兩個學生，而機會卻降臨到我們身上。我們在大學同系同科，同是室友，當同一學會的幹事，畢業後同當教師，友誼維持了五十多年。

大學學位是考取了，但經濟仍是問題。幸好我家本是讀書人，到這刻，沒有不支持我的理由。所謂支持，也只是讓我不必趕著賺取工資養家，我的學費和生活費，仍是要自理的。那時我申請了助學金（Bursary），有機會面試，但沒有成功。

當時港大的學費是每年 1,100 元，分兩期繳交，首期 700 元，第二期 400 元，還有一些開學的雜項開支，籌措這筆費用也是頗費周章的。一個我當聽差時對我不錯的長輩，知道我考進港大，主動送了 400 元給我。父親為了我開學，代我起了一

份義會，籌得了一筆錢。這筆貸款，我要到將近畢業時才全部清還。

1966 年 10 月初，我穿上了「綠袍」（green gown），踏進陸祐堂，參加開學典禮，正式成為香港大學的學生，開始我人生的另一頁。

17. 後記

回顧我從「永別亭」到「陸祐堂」所走過的路，進入官立夜中學應是轉捩點。官立夜中學對我的影響，在於它提供了我一個機會，讓我一步一步完成正規教育。我是從官立夜中學進入港大的第一人，在我之後，仍有人循這條路進入港大，我知道的名字有麥燕玲、薛鳳旋，都是低我一兩屆的港大同學。其他就我所知，有畢業後讀師範做了教師的，有讀會計做了會計師的，還有一個畢業前轉讀日校，大學畢業後做了政務官（AO），成了處長級高官。可惜的是，官立夜中學在 2005 年外判了給辦學團體，然後逐年萎縮，以致完全停辦。香港過早輟學的青年，亦因此少了一道上進的階梯。皇仁書院那些品學兼優的同學，則給了我做人的模範。至於港大，最主要的是建立了我的信心，不過這不在本文的範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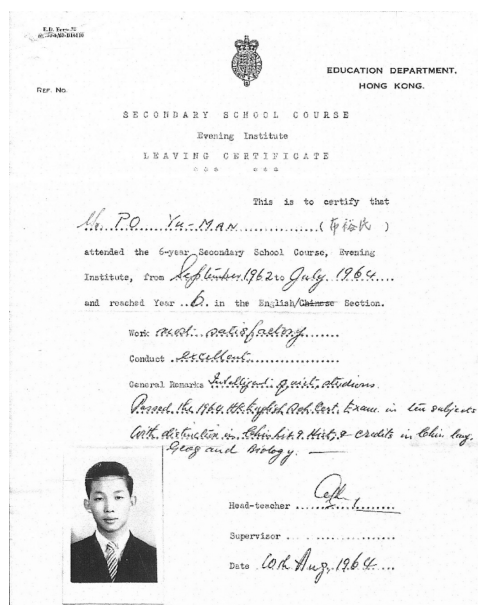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、沒有學校名稱的離校證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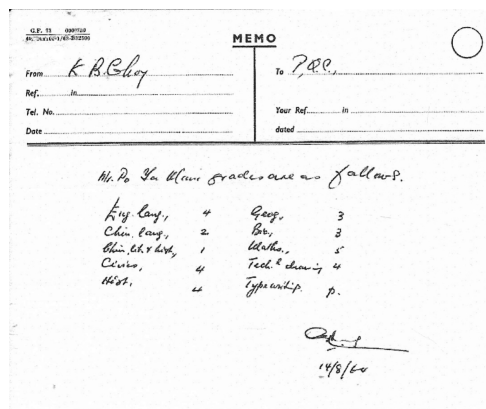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、簡陋的成績證明書